



人才摇篮丛书

B型·写作系列

传记文学写作浅谈



人才摇篮丛书·B型·写作系列

传记文学写作浅谈

徐 江 鲍震培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人才摇篮丛书—B型·写作系列

传记文学写作浅谈

徐 江 鲍震培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省南宫市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960毫米 1/32 3.75印张70千字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01—1500 定价:1.10元

ISBN 7-5376-0537-8/G ·352

序

金 梅



不像通常工艺品的制作，只要严格地按照一定的方式和流程，加上熟练的操作，就能生产出符合规范的产品来。写作，尤其是各种文学体裁的写作，没有一套固定不变的程式供你受用。所以说，工艺品的制作常常可以父子相继、师徒传授，而即使是写作上的铁笔圣手，也很少听说他们都培养出了青胜于蓝的后生晚辈。

这倒不是说，写作上就无普遍性的规律可以遵循了，规律还是有的。

比如说，文学创作是确实需要一定的天赋的，但先天性的因子，如若不与个人的生活实践和整个社会的生活实践相结合，不以后者去加以触发，加以充实，加以完善，那也只能停留于想入非非，天马行空罢了。

再比如说，人类始初时期的文学创作可以论矣（那是属于原始的、粗野的和不自觉的东西），而文学艺术已经发展到了现在这个水准

上，如若有谁既想写出超越于前代的作品，却又要拒绝从一切已有的成果中进行借鉴和吸收，则是不可想象的事。这是说，谁想学习写作，就需要阅读大量的优秀之作。俗语讲，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会吟，则是会作的征兆。

又比如说，尽管文无定法，但法可已出。只要不断地在实践中摸索、磨炼、总结，就会从不自觉中逐渐自觉起来。不必把写作看得过于神秘了，持之以恒，矢志不移，多读加多写，总有一天，你会心手相应，心到手到的。

还比如说，几乎所有的大作家都讲到过，真诚是写作的起码条件。唯有真诚，才能真实，真实才能取信于人，取信于世。无病呻吟，文过饰非，只能造成虚假的文字；而文字上一旦虚假，比沉默无言更有害。所以又说，学习写作首先就要树立起对己、对人、对事都能以真诚出之的品格。

如此等等，这是就大而言之。而在把握了这些大的方面之后，对前辈们在摸索、磨炼中积累起来的一些具体经验、具体方法，就可以从参考、借鉴的角度上加以留意了。正是出于这后一方面的考虑，天津写作学会的几位同志，在社联的支持下，分头撰写了这套《写作系列》丛书。

丛书的作者们，在行文中力求做到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知识性与学术性相兼顾；在介绍已被

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的经验时，又试图展现出某些新观念和新方法。在丛书的读者对象上，也是有所设想的：希望能引起有志于写作的中学高年级学生和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一般读者的兴趣。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于天津

目 录

序	金 梅 (1)
一、梦里寻他千百度.....	(1)
二、去忌讳 放胆写.....	(14)
三、“拿证据来”	(23)
四、多元化 全人格.....	(31)
五、传记文学的“这一个”	(42)
六、难走的“钢丝”	(54)
七、写出人物的心灵史.....	(65)
八、传记文学的心理描写.....	(75)
九、传记是门选择的艺术.....	(85)
十、传记文学的议论.....	(94)
十一、史学 史识 史才.....	(101)

一、梦里寻他千百度

选择一个可意的传主是传记文学作品成功的重要原因。美国传记文学作家贾斯廷·卡普兰说：“传记作家就像骑师，没有一匹好马是跑不赢的。”这个比喻虽然对传主有不恭敬的意味，但他讲的道理是对的。选择传主是非常重要的。可是面对茫茫的大千世界，一个作家选谁作为自己的写作对象呢？以什么标准去寻找自己的“意中人”呢？“梦里寻他千百度”，“为伊消得人憔悴”。

梁实秋在一篇序文中说：“写传记，须是可传之人；写回忆，应有可忆之事。”我们以为在选择传主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是传主自身的经历是否具有传奇性。这一原则主要是从传记文学的文学性出发的。传记文学根本性质是文学，是一种特殊体裁的文学，“原型即典型”，它的真实性原则束缚着作家的手脚，使他不能驰骋虚构的骏马去编造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所以只有那些

本身经历复杂、充满传奇色彩的人，他们那非凡的经历、生活的道路，才能为读者构成审美悬念，满足他们的审美和猎奇心理。在《人物》杂志开展的传记作品写作讨论中，署名子真撰文写道：

“人物传记要写得成功，这和对传主的选择很有关系。有的人物个性鲜明，经历丰富，像‘将军本色是诗人’的陈老总，本身就有很多生动感人的情节和细节。反之有些人经历平易，虽有成就而特出之点不大显现，这就需要靠作者去深入挖掘那些易于忽略而又确实闪光和感人的东西；否则，就容易流于平淡，还不如另选传主。”人人都可以立传，但并非人人都可进入传记文学。因为这种文字需要有形象，有性格，有故事，而不仅仅简单地记述某一个人。传主自身的传奇性可以省却作家艺术再造的诸多麻烦，它以人物真实的传奇经历使虚构的小说相形见绌。相反，没有传奇色彩的人物，虽有杰出的成就和较高的声望，照样使传记文学家望而却步。因为这不是功臣、英雄、名人录。

我国近年来传记文坛力作——《画魂——张玉良传》颇受读者欢迎。它的成功，首先归功于对传主的选择。作者石楠选择了一位很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张玉良，她那曲折、复杂的人生经历催人泪下。张玉良自幼丧父丧母，后被舅父卖入娼门为妓，遇到富有同情心的潘赞化为其赎

身，并支持她求学深造，留学法国攻习美术，最后成为一个著名画家。纵观张玉良的一生，她生活的时代跨度宽阔，从军阀混战的民国初年一直到社会主义中国的七十年代；她生活的地域幅员广大，从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方商港芜湖、上海一直到发达的资本主义都会巴黎、罗马。人物长期活跃在如此巨大的生活舞台上，不能不打上时代和空间的印记，所以说传主的人生经历有复杂的时代和空间的传奇性。而在这特定的时代与空间里，张玉良从孤儿——雏妓——小妾——艺术的追求者——中国美术最高学校的教授——直至成为世界艺坛知名的艺术家，这是古今中外经传中十分少见的人生公式，在这一步一步漫长岁月所走过的足迹里，传主那充满艰辛和苦难的独特命运也具有极大的传奇色彩，令人惊叹。因而构成了传记文学《画魂——张玉良传》的“物质基础”。正如作者在《题序》中说：它是“近乎神话般的奇迹”。同样，我国著名画家张大千也是传记文学的极好的题材。张大千被誉为“中国五百年来第一人”，“世界当代第一大画家”，他一生在绘画艺术上追求至真、至善、至美，堪称中华文化史上一代风范和奇人。他有异乎寻常的生活场景，有出神入化的艺术生涯，他是最富有的穷人，他也是最穷困的富有者。在风沙弥漫的大漠之中，张大千用两年七个月的时间揣摩敦煌壁

画，并险遭土匪伤害，死里逃生；半生浪迹异国他乡，醉梦巴西“八德园”、涉足阿根廷、日本、法国……。甚至连他的衣着打扮也不同常人：一顶东坡软帽，一袭宽松锦袍，一根竹杖，一缕美髯，神采飘逸，情怀放荡，颇有采菊隐士之遗风。奇才、奇技、奇行、奇貌，探寻他的人生踪痕，会使读者在学、才、情、历诸方面得到熏陶，得到享受。因此，以张大千为题材的传记文学就有几本之多，都颇有文学性、可读性。

安德烈·莫洛亚说：“如果一个人的一生悲惨地结束，就更增添了悲剧之美。”（《传记是艺术品》）富有传奇色彩的悲剧人物会增加新的动人因素。前边所说张玉良传，实际上是充满悲剧色彩的。当然，按照莫洛亚的观点去看，英国著名传记作家罗曼·罗兰所著《弥盖朗琪罗传》的传主是最为典型了。“在翡冷翠底国家美术馆中，有一座为弥盖朗琪罗称为‘胜利者’的白石雕像。这是一个裸露的青年，生成美丽的躯体，低低的额上垂复着卷曲的头发。昂昂地站着，他的膝盖跪曲在一个胡髭满面的囚人背上，囚人蜷伏着，头伸向前面，如一匹牛。可是胜利者并不注视他。即在他的拳头将要击下去的一刹那，他停住了，满是沉郁之感的嘴巴，和犹豫的目光转向别处去了。手臂折转去向肩头，身子望后仰着；他不再要胜利，胜利使他厌恶。他已征服了，但

亦被征服了。这幅英雄的惶惑之象，这个折了翅膀的胜利之神，……它即是弥盖朗琪罗自己，即是他的全生涯的象征。”这位世界著名的画家、雕塑艺术家的一生是悲惨的一生，充满痛苦的一生。他的痛苦是他自身的性格和精神造成的。他是孤独的。他恨人，他也被人恨；他爱人，但不被人爱。人们对他是钦佩，又是畏惧。他甚至“从没有最微贱的生灵所能享受的温柔——即在一生能有一分钟的时间在别人的爱抚中睡眠。妇人的爱情于他是无缘的”。他是弱者。在艺术上，政治上，在他一切行动和一切思想上，他都是优柔寡断。“在两件作品，两项计划，两个部分中间，他不能选择。”足以解释他一生的悲剧——而为人们所最少看到或不敢去看的关键——“只是缺乏意志和秉性懦怯。”他常常有开始，却没有结果；他才选定，他已开始怀疑。如“比士之战”的图稿，于勒二世的铜像在他生时便毁掉了，而于勒二世的坟墓，梅迭西斯的家庙便可怜地流产了。尽管如此，九十年的巨大劳作，忙得没有用餐的时间，创作了许多许多艺术精品，然而他却从没有以自己所应做与能做的事而感到安慰。他思想上只有悲哀与痛苦，“我的欢乐就是悲哀”，这是他发自心底的绝望呼声，一直到从时间中超脱。这种悲惨与痛苦虽然不同于物质的匮乏，疾病、命运的偏狂，但同样是：

可悯的。罗曼·罗兰在写完《弥盖朗琪罗传》之后，曾经有一种忧虑，他曾自问“在想给予一般痛苦的人以若干支撑他们的痛苦的同伴时，我会不会只把这些人的痛苦加给那些人。”因而，他感到是否应该“只显露英雄的英雄成分，而把他们的悲苦的深渊蒙上一层帷幕”？后世人应该感谢罗曼·罗兰没有这样做。人们正是从这些为疾病折磨、为悲惨的遭遇、为内心的惶惑和矛盾迭交于一身而坚持自己艰苦历程的人身上，看到他们为人类、为艺术献出自己的毕生精力，表现了对人类的真切的爱。这些传主的经历无疑具有更为深沉的审美价值，因而是传记作家所争写对象。

由传记的悲剧之美，有人还进一步说到“要使人的一生变得美好，就必须以失败告终”，“如果拿破仑没有流放到圣海伦岛去，那么他的一生就失去其全部悲剧情调了”，因而使其传记文学的美感就会大大逊色。由此我们想到，从传记文学的写作审美角度讲，我们也不要只把眼睛盯在那些成功者的身上，“失败者”的道路一般来说比“成功者”的道路更富有曲折性，他们理所应当也是传记文学的关注对象，遗憾的是，国内至今还没有见到这样一部令人心颤的著作。因为这样的传主太难发现了。

如果一个传记作者认为只有伟大人物的生平才使他感兴趣的话，那么他使自己的写作领域又

缩小了一大块。而且这种看法和艺术是格格不入的。在美术家的心目中，徐悲鸿1922年为无名老妇所作的肖像和1940年为泰戈尔所作的肖像同样都是宝贵的。肖像艺术本身不会因泰戈尔的名字而无与伦比，因此具有传奇因素的小人物、无名之辈同样也能够写出优秀的传记作品来。在这一点，我们古代的传记作家的笔触比今人注意的更宽泛。如司马迁《刺客列传》、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王禹偁《唐河店妪传》、戴名世《画网巾先生传》等等，所记传主有的是游侠，有的是种树驼背翁，有的是无名老妇，有的是无名君子。这些作品并未因传主出身低贱而埋没于世，相反都作为古代散文佳作被选辑于各种文集之中。传主的惊人之举也传于后世，甚至比那些达官贵人更有影响。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刘师亮外传》。刘师亮是四川民间的幽默文人，出身寒微，没干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没有什么大著行世，但他那幽默辛辣的谐联却长期在民间流行，受到群众的喜爱。军阀杨森统治川蜀期间，巧立名目收捐派税，居然连农民进城挑粪也要收取“讲卫生”费。刘师亮对此十分愤慨，写出一幅对联，上联是“自古未闻粪有税”，下联是“而今只有屁无捐”，横批是“民国万岁（税）”。此联曾使杨森气得暴跳如雷。刘师亮从民国八年到民国二十五年，十七年

间每逢“双十节”都要贴出对联，常常引得市民争相传看。军阀刘湘病死武汉，成都老百姓被迫沿街接灵，刘师亮为此写出对联，上联是“刘甫公千古”，下联是“中华民国万岁”。有的说上下联对不起来他说，“刘甫公（刘湘的字）是对不起中华民国的嘛。”为这么一个平平凡凡名贱身微的小人物出传记，不但为了解军阀时期四川社会现状提供了一个侧面，而且使人物传记画廊里增加了一个怪人的形象，这样的传记是不多见的。

传奇性，并不是选择传主的唯一条件，或者是唯一标准。我们在选择传主时，与其说是为了纪念传主，倒不如说是为了教育后人。因此在富有传奇性的前提下，还应该考虑传主的人生经历，他的思想，他的事迹能给人的教育。人们学习历史，是为了明了治乱兴衰，探索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人们阅读人物传记，则是为了解剖一个人的生活历程，玩味他的成功和失败，借以从中汲取有关的经验，作为自己奋斗的借鉴。传记文学家有这个责任，传记文学作品有这个责任。罗曼·罗兰在写《贝多芬传》时，便特别声明了这一点。“不幸的人啊！切勿过于怨叹，人类中最优秀的和你们同在，汲取他们的勇气做我们的养料罢；倘使我们太弱，就把我们的头枕在他们膝上休息一会罢，他们会安慰我们。在这些神圣的心灵中，有一股清明的力和强烈的慈爱，像激流一

般飞涌出来。甚至毋须探询他们的作品或倾听他们的声音，就在他们的眼里，他们的行述里，即可看到生命从没有像处于患难时的那么伟大，那么丰满，那么幸福。”人们可以从《贝多芬传》中看到他“不顾自然的阻碍，竭尽所能的成为一个不愧为人的人”，鼓舞人们应当“自助”。

因此，罗曼·罗兰所写英雄传的主人公，全是那些具有伟大品格，具有伟大行动的音乐家、雕塑家兼画家以及作家。这些传记中传主的生涯，几乎都是一种长期的受难历程。或是命运悲惨，把他们的灵魂在肉体与精神的苦难中进行折磨，在贫穷与疾病的铁砧上锤打；或是目击同胞受着无名的羞辱与劫难，而生活被戕害，内心为之碎裂。他们“由于毅力而成为伟大”，“由于灾患而成为伟大”。这样的传主可作人生的镜子，使读者明白“如何生，如何死”。正如著名书评家赵鑫珊在《传记作品能给我们什么启示》一文所说，阅读这些传记，可以“意识到人的价值和尊严，最后引导我们发现我们自己”。（《书林》1984年6月）

人生需要多方面的营养，因而传记文学作家的选择也不应该仅仅局限在那些具有高尚人格的伟人身上。他们的描写领域，除了那些对历史发展做出重大贡献、伟大牺牲的卓越人物之外，对那些曾严重阻碍历史发展前进的政客、军阀、阴谋

家、野心家、流氓、恶棍等各式各样的“反面人物”也应该加以描写、刻画。如《韩复榘传》、《吴佩孚传》、《张宗昌传》等等。因为对这些历史人物如何逆历史潮流而动进行剖析，对他们如何专权倾轧以及自己如何骄横淫逸、欺凌人民的历史加以揭露，同样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历史发展的复杂面貌，并从中汲取历史的教训，使人们有所警惕，引以为鉴。我们这样做，无疑会使传记文学的写作范围大大扩展，传记文学作家也增加了更大的用武之地。

从教育性的标准选择传主，还应注意的一点除了社会伦理道德方面的价值外，再应看重的就是能否给读者以“智的价值”。所谓“智的价值”就是指对读者“智识”的给予。就是说所选传主的生活经历能够丰润读者智的生活，帮助与促进读者对于生的了解和享乐，增加读者的经验而澄清对某些问题的认识，或者赋予读者解决问题的能力，能使人们的精神生活更丰富和扩大起来，这样的传主，也是受人欢迎的。柳宗元所写《种树郭橐驼传》中的郭橐驼，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小人物，其貌不扬，是个“驼背翁”；其事不伟，以种花木为生。但其技颇高，他种出来的花木“或移徙，无不活，且硕茂蚤实以蕃”。长安豪家富人，“皆争迎取养”。人问其故，他有一套理论。关键在于“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也